

焦点透视

编者按

媒体以怎样的报道方针呈现女性形象,影响着社会整体对于当下女性的认识程度。6月17日上午,“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她’青年学者论坛”线上举办,来自1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媒体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女性网络文化安全、媒体中的性别隐忧、新媒体女性赋能和女性传媒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她”

■ 王慧 李特帆

媒体以怎样的报道方针呈现女性形象,影响着社会整体对于当下女性的认识程度。6月17日上午,“大众媒介如何建构我们眼中的‘她’青年学者论坛”线上举办,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澳门大学、中国妇女报社等1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媒体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本次论坛由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女子学院科研处联合举办。论坛由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王慧教授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女性网络文化安全、媒体中的性别隐忧、新媒体女性赋能和女性传媒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媒体中的性别呈现

如何在传媒领域更有效地传递性别平等理念,如何多姿多彩地深入探讨媒介对女性形象建构的行动特征和实践特征,成为与会者关注的重点。

中国传媒大学王琴副研究员认为,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是社会文化延伸和多元化的表现,而女性议题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大众媒介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自媒体的高速发展,为女性发声提供了更多渠道,拓展了女性话题的公共空间。但也带来了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如网络性别暴力、网络符号暴力等,女性更容易成为网络中被暴力欺凌的对象。维护网络安全主体是网络中的传播者,因此,她主张,要培养青少年的网络伦理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强化青少年网络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重视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媒介赋权和媒介参与。同时,通过落实网络监管

与评估,制定具有性别意识的网络文化安全法规,鼓励和引导女性青少年关注网络信息安全等途径,构建性别平等的网络文化环境。

中华女子学院刘阳副教授认为,新媒体因其去中介化、普适逻辑的特点,为女性赋能提供了一种实践工具,激活了女性个体动能,拓宽了女性就业渠道、分享了平衡家庭的经验。但因入职门槛低、信息生产者素质参差不齐、监管不严和法律存在的漏洞等原因,新媒体女性从业者兼职多、收入低、社会保障缺失,同时还面临数字性别鸿沟、舆论风险等挑战。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应培养具有先进性别意识的应用型女性人才,加强对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培训与引导,建立新媒体与女性之间的新型关系,使传播信息和知识真正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及改善女性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肖倩博士基于对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之间发布的正文中包含“援鄂医疗队”的所有微博分析发现,在COVID-19期间女性构成了一线卫生部门的主要力量,既受到关注又充斥着性别偏见,社交媒体对她们的呈现是矛盾的,往往强调其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等家庭角色,职业参与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和准确的报道,或者被隐藏在无性别集体身份的背后,忽视其发言权和曝光度。她认为,必须通过媒体实践采取行动,以应对女性在日常生活媒体中的隐忧和矛盾性呈现。

山东女子学院董小菲副教授的报告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333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自1981年至2021年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的30年历程,将其划分为“介绍期(1981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转型期(1995—2004年)”“反思期(2005—2014年)”和“包容期(2015—2021年)”四个阶段,梳理了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些关

键事件。在肯定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取得重要进步的同时,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目前存在的问题总结为四个方面,即有关女性传媒工作者研究的数据在波动中上升,但整体数量不多;研究者整体的学科背景多元,但缺乏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未形成学科和本土的学术自觉;研究议题较丰富,对其职业形象的研究最多,其次是职业生存发展,对新兴领域关注不足;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但基本是其他学科观念或理论的移植,甚至坚持社会性别方法的也不多,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更是少见。

议题评议

中国妇女报社理论部主任、《新女学》周刊主编蔡双喜,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院特聘教授叶文振作为评议人,对四篇报告给予了评议。

蔡双喜提出,王琴的报告梳理了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安全新问题,为构建性别平等的网络文化环境提出了对策,建议其结合《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刘阳报告中关于传播工具变化的观点,对于深入理解马歇尔“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著名观点非常有益,但将平衡家庭作为新媒体赋能女性的效果值得进一步商榷;肖倩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呈现这一议题的研究具有价值,但如果在研究能够考虑到部分新媒体工作者自身性别平等意识缺失的问题,该研究将更为全面深入;董小菲的研究学术视野广阔且细致,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可能需要扩展检索关键词才能将新媒体从业女性纳入进来。

叶文振认为王琴的报告全面展示了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文化安全环境问题,同时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对于女性青少年面临的网络

文化安全环境问题,应该做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归类,从而实现更为精准的数量描述;第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网络文化安全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后果的研究;第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需要强化原因分析,没有深刻的原因分析为基础的话,提出的政策建议会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关于刘阳的报告,叶文振肯定了新媒体与女性赋能这一研究问题的重要价值,并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在谈到“赋能”问题时,应该对“赋能”提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概念;第二,要关注赋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以及影响赋能效果的具体因素,从而优化赋能路径;第三,要根据对赋能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叶文振认为,肖倩的报告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但是仍有不足,因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可以尝试进行多个国家之间的比较;第二,以微博代表中国社交媒体是否有以偏概全的可能,如果将所关注的平台进一步扩展,则结论将更加可靠;第三,在分析社交媒体中存在的对女性的不对称呈现时,如果能够引入更多的实证性材料,则可以更好地支撑分析结论。叶文振认为,从董小菲的报告可以看出,如果能够提升女性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责任,以及提升其在传媒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能够增加传媒对女性的积极影响。

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叶文振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对新媒体、性别及女性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要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第二,鉴于新媒体与性别关系的跨学科特性,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相关学科力量加入,使得研究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并在学科比较当中发现各个学科固有的缺陷;第三,要加强研究的统计规划与定量分析;第四,要把对策研究建立在深度的原因解释上,使得对策建议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与效率。(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

研究视窗

《男性应该得的多?——基于对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态度的考察》

作者:于乐荣 张颖 杨博琼

性别平等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本文利用涵盖7个省的样本数据,采用情境方案设置和心理学实验方法,测量农村居民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偏好及选择。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受访者个体差异后,性别因素显著影响个体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偏好。具体来看,农村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调节性别收入差距的分配方案,但随着初始性别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以及男性转出额度的增加,农村男性赞成调整的可能性下降。同时,农村男性和女性对彻底改变初始收入分配结构方案的偏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秉承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农村居民更认同同性别收入差距存在的分配方案,而不是绝对的性别收入平等。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为母则刚:从生物性母职到社会性母职的建构过程》

作者:陆杰华 张宇昕

探讨当今女性的母职体验及其认知有着明显的应用价值。基于哺乳是女性正式承担和认同母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判断,以女性的哺乳实践为切入点,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C市中产双薪家庭新任妈妈的一孩哺乳和母职习得的考察发现,新任妈妈在哺乳时普遍遭遇了身体的不适与身份的焦虑。尽管相信母职天生,但她并没有因此牺牲自己的主体性,而是通过弱化生物性母职来追求孩子与自身主体性相统一的新型母职。“为母则刚”不再要求母亲一味地为了孩子吃苦受累,而意味着母亲愿意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未来而不断奋斗,努力使自身变得更强大。新型母职的实现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支持,因此,下一步应促进性别平等的就业,并提供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以消除新型母职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反思与消解:新闻标题的“去性别化”研究》

作者:张明 刘坤婷

本文从“污名化”理论入手,分析“性别化”新闻标题如何对两性进行污名化,并在框架理论的视角下反思“性别化”新闻标题存在的问题;其在议题内容上以社会新闻为主,报道语言多为高关注度、高话题度,态度倾向意在迎合和加固人们对两性的刻板印象。新闻标题“去性别化”的消解,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引导、纠偏力度,行业部门增强自律意识,互联网社交平台要提高审查水平。

来源:《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5期

(刘天红 整理)

观点秀场

青春怀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情感叙事

——以《芳华》《山楂树之恋》《青红》为例

阅读提示

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人世间》勾起从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从《青红》到《山楂树之恋》再到《芳华》,这段岁月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的重要因素;身体、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生命朝气,主体意识推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她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观看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

■ 蔡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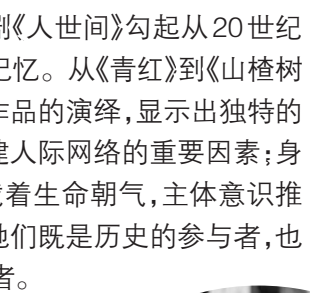
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人世间》讲述了北方某省会城市周姓一家三代50年来随着时代巨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勾起从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从2005年张小平导演的《青红》到2010年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再到2017年冯小刚的《芳华》,这段岁月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愈发显示独特的魅力。

身份认同与女性人际网络的建构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的重要因素。受身份制约的女性通过寻求身份的重新确认,追求进阶之梯,但又免不了陷入新的尴尬和困顿。

在《芳华》中,何小萍挥之不去的身份阴影来自亲生父亲以及被迫跟随母亲改嫁后新家庭的排挤。她试图以“文工团女战士”这一全新的身份重塑自我,却不料遭遇来自集体的生理歧视和身份歧视。舞蹈搭档宋克拒绝与她身体接触,除刘峰以外的男性战友皆是冷漠的“看客”。在文工团女性群体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汗臭”和“假胸”事件。女性同伴耻笑她缝着搓澡棉的内衣,当众撕扯她的衣服以获得围观的快感。“隐忍”成了她身处微妙人际网络中的唯一选择。在战友们的熙攘的喧闹中,“独自练功”的镜头特写揭示了她在集体中“缺席”的位置。

如果何小萍的困境源自集体关系的紧张,那么《山楂树之恋》中静秋的成长则得益于相对宽松的人际环境。父亲的身份同样带给静秋沉重的压力与生活的艰辛:瘦弱的静秋课余做手工,在烈日下拉车,徒劳地搅水泥导致皮肤溃烂。与何小萍相似,静秋积极参加劳动、获得留校资格。不同的是,静秋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出包容性的温情:下乡采风时村长一家照顾有加;学校领导安排工作助其留校任教;出身高干家庭的男友对她体贴入微。静



《芳华》



《山楂树之恋》



《青红》

秋一些“越轨”行为,如偷偷与男友在河边嬉戏,在僻静的林子里约会,坐着男友自行车驰骋在大街上等,竟从未被他人发现,这使得影片弥漫着一种近乎“虚幻性”的浪漫,最终以男女绝症病亡的悲情规避了他们家庭之间在身份方面的鸿沟。

青春躁动与女性主体欲望的屏障

身体、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生命朝气和生理欲望,而现实环境却无法压抑女性的青春躁动,经由启蒙而唤醒的主体意识终将推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

《山楂树之恋》通过颂扬静秋与孙建新的浪漫爱情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本能。孙建新扮演着少女静秋的青春启蒙者:以交换钢笔撬动了她的情感初开,在借助树枝牵手过河、赠送泳衣和接吻中感情升温,在医院宿舍的床榻拥抱更促使她的生理和情感欲望达到高潮,静秋也逐渐由羞涩、忐忑变得主动、大胆。尽管孙建新的病亡为他们的爱情故事画上了终止符,但他对于静秋主体性生命的激发并不止于生理层面,还在于精神解放。改革开放后,静秋走出留校工作的岗位,出国留学的教育契机推动着她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青红》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为偏远的贵州乡村带来一抹朝阳和晨露,女性对于青春、激情的向往和追求显得更为大胆、奔放。邓丽君温婉的情歌弥漫在充满荷尔蒙的昏黄灯光下,参加舞会的女性共用一支口红,化着蹩脚的妆容,在男性舞友的拉拢下表现出欲迎又拒的羞涩。其中最为无所顾忌的是小珍,她与吕军在舞会上短暂邂逅,先是在混乱的打架场疯狂热吻,后因外出实习而发生性关系,甚至在吕军新婚之后偷偷私奔。诚然,长期困守在精神贫瘠的农村地区,导致女性对于自由、爱情的理解存在单一向度的偏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历经生活和感情磨难后重新回到家乡的小珍,褪去了稚气和浪漫。

与小珍不同,青红的情感欲望充满压抑感。父亲通过监督和限制社交圈,偷看情书,扔掉男友赠送的红色皮鞋等多种形式,杜绝青红与农村男青年恋爱。表面上看,青红的抑郁来自父亲的压制,但背后隐藏着两代人深层次的价值分歧: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在改革开放之初迫切“回城”的愿望,与早已将“他乡”视为“故乡”的子女之间存在着隐性的隔膜。

旁观者的历史讲述与逝去的时代芳华

人物画外音的讲述和经典意象的重现,掌控着故事进展的方向和节奏。他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观看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记录着特定年代青春的激情与顿挫,书写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幻向。

在《芳华》中,从文工团的女舞者成长为女作家的萧穗子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一代人的青春芳华。镜头跟随她的眼睛,透视着文工团各式人物

的生存百态和命运跌宕。萧穗子与何小萍有着相似家庭背景,“规避纷争”和“隐忍自保”是她拓展生存空间的被迫选择。因此,尽管她对何小萍的境遇感同身受,未曾参与集体的霸凌,却从未对她提供实质性帮助。在故事结尾,萧穗子对郝淑雯和检举英雄的林丁丁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嘲讽。前者虽家庭富裕但忍受了丈夫长期分居的煎熬,后者沦为金钱至上主义者。

在《青红》和《山楂树之恋》中,红色的信物(红皮鞋和山楂树)是恋人传递情意的媒介,不仅承载着爱情的浪漫话语,而且隐喻着转折年代的时代症候。青红偷偷地在野外穿着小根赠送的红皮鞋,洋溢出少女的青春萌动;红皮鞋被父亲扔出家门,更燃起了青红内心强烈的叛逆;小根重新捡回红皮鞋的晚上,却冲动之下试图以强奸的方式留住青红,不料从此葬送了彼此的爱情和前途,反映出转折年代城乡身份的区隔在青年男女之间逐渐显现的鸿沟。与“红皮鞋”相似,“山楂树”也蒙上了悲情的浪漫色彩。下乡初见时,山楂树“开红花之问”调动了彼此的情愫,等待明年看花成为未竟的约定;回城后,山楂果传达着孙建新对静秋的怜爱和思念;孙建新离世前,静秋穿着山楂树的衣服前往送别。意外的是,影片结尾出现了满树白花的山楂树,破解了贯穿故事始终的“开红花”这一传说,这既意味着他们在青春年华中诗意的爱情成就而生的血色浪漫终将成为神话,也暗示了山楂树的英雄史诗慢慢淡却,时代车轮正悄然地发生转折的风潮。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共产党妇女福利事业史料整理及研究”(2021MS055)阶段性成果。